

“不敢休、不够休、不能休” 的子女陪护假

当一项政策从纸面走向生活,度量它的往往不是条文,而是普通人被改变的具体日常。

2025年末,随着上海等地将子女陪护假正式写入地方性法规,这场始于九年前的制度探索进入了新的阶段。

我们记录了三位身处不同地域、行业的年轻人在父母病榻前所经历的日子。他们的困境和曙光,共同勾勒出这项公共政策在落地时最真实的样貌。

“你可以离开工位,但工位不会离开你”

11月20日,是上海市的白领陈薇休子女陪护假的第七天。母亲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手术,身上的引流管还没有摘,陈薇和父亲交换陪在医院里。

在母亲确定手术日期后,陈薇本来想请年假,闺蜜告诉她,上海市11月1日刚施行的《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》中规定,独生子女父母患病住院期间,每年可享受不超过7个工作日的陪护假,工资待遇不变。

听到这个消息,陈薇想试试看,能不能先请子女陪护假。

陈薇拨通HR的电话:“我要申请子女陪护假……”

流程比想象中顺利。陈薇提供了独生子女证明和母亲的住院记录、诊断报告,加上公司内部表格,电子流程走了两天就批下来了。

不过,法律没有规定的是这7天如何度过。

第一天,她在病房里接了5个工作电话;第二天,她一边举着输液袋陪母亲去洗手间,一边用耳机参加项目会议;第三天,母亲呕吐时,她正对着手机那头的投资人解释季度财务预测。

第七天下午,母亲精神好些,忽然说想吃梨膏糖。陈薇打车来回花了一小时,买回糖时,手机上积累了23封未读邮件。

这7天里,陈薇能明显感到自己在团队中的位置正被微妙地调整——重要的会议不再总是@她,核心数据开始由副手先行处理。没有人明说,但那种逐渐被推向边缘的感觉,让她很不舒服。

最后一天陪护假的次日凌晨一点,母亲睡得很沉。陈薇收拾好东西,给护士站留了字条,轻轻带上门。她走向电梯时,手机又震动了,微信那头是投资总监:“明天九点晨会,讨论你的项目后续安排。”

7天前,她抱着笔记本电脑走进病房时,以为自己在践行一项新权利;7天后她离开时明白,这项权利有个隐藏条款:你可以离开工位,但工位不会离开你。

这一周里,那些如影随形的线上会议、深夜弹出的工作消息以及归队后可能面临的项目调整,都清晰地告诉她:法律能规范假期,却难以改变职场对员工随时待命的期待。

三兄妹的“排班表”背后

李小川的手机屏幕上,是一张Excel表格。

横轴是日期,纵轴是三兄妹的名字:大哥李大川(在广州工作)、二姐李秀英(在成都工作)、他(在四川乐山本地工作)。表格用不同颜色填充:绿色代表“已陪护”,红色代表“需调班”。

这张表从父亲3个月前确诊肝癌时开始制作,已经迭代了十几个版本。

“二姐,你22号那周真调不开?”李小川在家庭群里问,李秀英回复:“公司接了新项目,我是负责人。要不让大哥提前回来?”李大川回复:



图片源于网络。

“我刚请过假送爸来住院,再请主管要杀人了。小川你不是在本地吗,多担待点。”

李小川盯着屏幕,胸口发闷。

他在本地不假,在四川省乐山市的一家机械厂当质检员,月薪四千二。但“在本地”意味着什么?意味着大哥二姐可以理所当然地说“你近,你去”;意味着3个月来他请了11天事假,工资扣了快两千……

其实,四川的子女护理假政策出台很早。2018年修订的《四川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》规定:“老年人患病住院期间,子女所在单位应当支持护理照料,独生子女每年累计不超过15日,非独生子女每年累计不超过7日。”

11月下旬,父亲要进行第3次化疗。排班表又卡住了。李小川在车间厕所里给二姐打电话,二姐在电话那头叹气:“我手下十几号人,项目月底交付,这时候走,老板怎么想?”紧接着是沉默,然后电话挂了。

最后是母亲解决了问题。“你们都别吵了。”母亲在群里发语音,“我来看护。我身体还行,把店面也租出去了。”

那天晚上,李小川在排班表上把自己名字后面的空白单元格全部填成了绿色。他在群里打字:“不用请护工,我来。我这工作反正也快干不下去了。”

他没说的是,车间主任上午找他谈话,暗示如果继续这么频繁请假,下个季度续签合同可能“有困难”。

按发送键后,他想起《四川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》里那句话:“非独生子女每年累计不超过7日。”法规给了他们每人7天假,但没教他们,当父母的病需要的照料时间是70天、700时,这7天该如何分配?那多出来的63天、693天又该由谁买单?

“要请长假?写辞职报告”

王磊是河南人,他给父亲的“陪护”是远程的。王磊在深圳打工,每天午休时都要跑回宿舍,和在老家县医院的父亲视频。父亲躺在病床上,插着氧气管,常常只能发出含糊的气音。通话时,护工发来信息:一种新药每天要380元。王磊盯着这个数字,回复“用吧”。

这种远程陪护已经持续17天。父亲突发脑溢血那天,王磊在流水线上打螺丝,姐姐打电话来,声音都变了调。他请了3天事假赶回去,在病房守了72小时。第4天早上,组长打电话来:“不是不让你尽孝,但线上缺人,你再不回来,岗位可能就留给别人了。”

王磊看着还没脱离危险期的父亲,又看看手机里银行卡的余额,最终买了当晚最便宜的硬座票,摇摇晃晃16个小时回到了深圳。

离家前,在县城超市工作的姐姐对他说:“我在本地能常来看看,你在外边,钱上多担待点。”

王磊平时喜欢刷新闻,他知道广东有子女陪护假。《广东省养老服务条例》里写了:“老年人患病住院治疗期间,子女所在单位应当支持其进行护理照料,并给予每年累计不少于15天的护理时间。”

王磊问过组长,组长表示没听说厂里有这政策。他又去问人力资源部,被回复:“要请长假?写辞职报告。”

对于王磊而言,陪护假就像老家的宅基地——知道在那儿,但回不去也用不上。

所以他只能这样远程陪护,有时父亲清醒些,会对着摄像头努力笑,嘴歪向一边。王磊在这头说着“爸你别动”,手指却忍不住划过屏幕,想替他擦掉流下的口水。

父亲病情恶化时,王磊请不下假也买不起机票,只能在流水线上打螺丝一边哭。组长递来纸巾,仍提醒他:“活不能停,停一条线全车间扣钱。”那天他打了三千四百个螺丝,每个螺丝的“咔嗒”声都在他心里换算成父亲在ICU的费用。

姐姐后来打电话来,说父亲可能要转去康复医院,每月费用约8000元。这意味着,工作还是不能停。

深夜,他把手手机立在枕边,让父亲沉重的呼吸声充满床帘内狭小的空间。他想,这就是他的“陪护假”——每天两次,每次二十分钟,用流量购买。政策条文中的“应当支持”,落到现实里,成了不敢轻易请假的工作表和午休时段的视频通话。

政策文本中的“应当”与“支持”,在生存成本面前显得有些无力。对王磊而言,陪护假依然只是手机屏幕上几行读得到却够不着的文字。

(来源:法制日报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)